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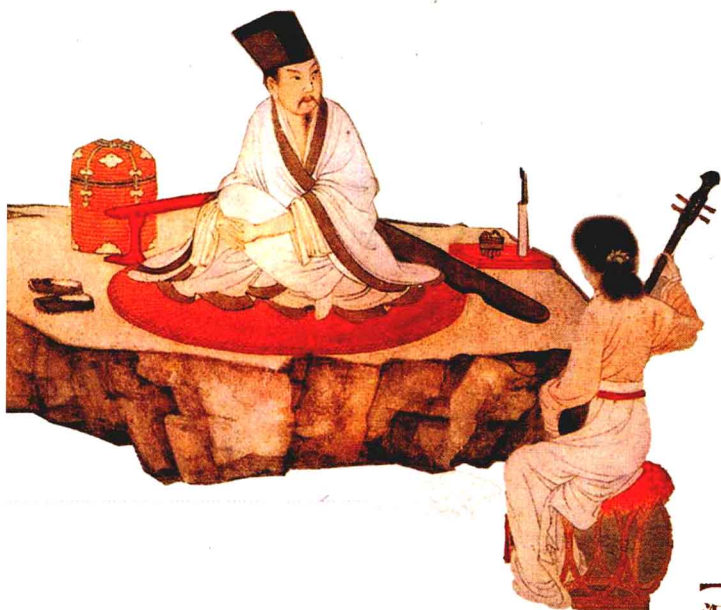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典藏

郑在瀛◎编著

李商隐诗全集

【汇编今注简释】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

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典藏

郑在瀛◎编著

李商隐诗全集

【汇编今注附校勘】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商隐诗全集 / 郑在瀛编著. — 武汉: 崇文书局,
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403 - 2114 - 7

I. ①李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唐诗 - 诗集
IV. ①I222. 7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9619 号

李商隐诗全集

出 版: 崇文书局
地 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
邮 编: 430070
发 行: 崇文书局 (027-87679712)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(027-87863005)
开 本: 710 × 1010mm 1/16
字 数: 500 千字
印 张: 37
版 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03 - 2114 - 7
定 价: 52.00 元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前言

李商隐的名字同他的绝妙好诗早已进入千家万户。即使读书不多的人,对于“昨夜星辰昨夜风”、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、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、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这一类感人肺腑、动人心魄的诗句,也能随口道出。李商隐的那些以“隐僻”著称的、以描写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细腻曲折的爱情心理为最大特色的诗歌,展现在我们面前,被更多的读者理解和接受而愈来愈受到世人的喜爱。

但是,李商隐的诗是不好懂的,解释起来很困难,元好问早有“诗家总爱西昆好,独恨无人作郑笺”的慨叹。梁启超在《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》一文中写道:“义山的《锦瑟》、《碧城》与《圣女祠》等诗,讲的是什么事,我理会不着,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,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。但我觉得它美,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。须知美是多方面的,美是含有神秘性的,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,对于此种文字,便不容轻轻抹煞。”美和神秘是李商隐诗歌的主要特点,如同《蒙娜·丽莎》画像那样以其表现出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令人神往。越是神秘,越是令人想探求出究竟。《四库提要》说李商隐诗旧有刘克、张文亮二家注本,后俱不传。明末释道源的注本也不复存在,其一部分内容保存在朱鹤龄的《李义山诗注》三卷中。至乾隆二十八年,冯浩完成《玉溪生诗笺注》,对朱鹤龄、徐湛园、程梦星、姚培谦、屈复等人的注释评点作了总结,尤其对李商隐生平事迹的考订远胜诸人,似乎玉溪生诗的谜底已全部揭开。尔后张采田的《玉溪生年谱会笺》对冯浩的某些错误作了纠正,岑仲勉又以

三万言的《平质》指出张氏的瑕疵。至20世纪80年代,有叶葱奇的《李商隐诗集疏注》问世,而刘学锴、余恕诚在出版《李商隐诗选》之后,又贡献出逾百万言的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,还有杨柳的《李商隐评传》、吴调公的《李商隐研究》、周振甫在《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》中所写的《李商隐》以及众多专家学者所发表的论文,真是盛况空前。20世纪80年代是李商隐研究最辉煌的十年。尤其是刘、余的《集解》和杨柳的《评传》费力最大,成就显著。章学诚说:“天下有比次之书,有独断之学,有考索之功。”《集解》长于比次,它将古代和现当代有关李商隐诗歌的注、笺、评点以及重要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完备地逐条胪列出来,并且指出其中的谬误,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,省其搜讨之劳也。而每篇之末的按语既融入了不少高见卓识,同时也颇多创获。杨柳的《评传》对李商隐生平事迹的考索非常仔细,特别是对其前期的成长和后期的行踪考察周详,是研究李商隐的重要依据。

在肯定清初以来众多专家学者对李商隐及其诗歌的研究成就的同时,不能不指出,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没有解决。也就是说,在李商隐生平事迹研究上、在对李商隐现存的六百余首诗歌的阐释上,还有不少的问题没有弄清楚,更有不少的解释是错误的。有些是朱鹤龄、冯浩说错了的,后人也跟着错;有些是朱、冯说对了的,后人反而说错了。对于读者来说,重视诗歌的解释,尤甚于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订,虽然二者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。冯浩在《玉溪生诗笺注发凡》第七条中说:“笺者表也,注者著也,义本同归。今乃以征典为注,达意为笺,聊从俗见耳。”这是说,注不过将所用典故一一著明,笺则须说明作品的现实意义及作者所处环境与故事如何。其第八条说:“说诗最忌穿凿,然独不曰以意逆志乎?今以知人论世之法,求之言外隐衷,大堪领悟,似凿而非凿也。如《无题》诸什,余深病前人动指令狐,初稿尽为翻驳。及审定行年,细探心曲,乃知屡启陈情之时,无非借艳情以寄慨。盖义山初心依恃,惟在彭阳,其后郎君久持政柄,舍此旧好,更何求援?所谓‘何处哀箏随急管’者,已揭其专一之苦衷矣。今一一诠解,反浮于(超过)前人之所指,固非敢稍为附会也。”冯浩的笺,原本打算脱离前人“动指令狐”的老路,另辟蹊径;经过一番“审定”、“细探”之后,反而超出前人之“动指令狐”了。

封建时代,谁不把政治关系看得比其他一切关系更为重要?只有君王,哪有自己?只有朝廷,哪个人?只考虑如何当好统治集团的工具,哪里会想到作为有血有肉有性灵的人的基本要求?难怪冯浩坚信义山“借艳情以寄慨”,欲与令狐郎君重修旧好,以求援引。冯浩是古人,可以谅解他。奇怪的是当代学者之相信旧说,更浮于冯浩。无征不信,试举例言之。《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》中有《李商隐》,传曰:“(李商隐)到了巴西,考虑到杜惊不会用他,决计北归,想向令狐绹陈情,他在巴西写了《夜雨寄北》……”又曰:“《无题四首》或是入京未补太学博士时写的,第四首说‘东家老女嫁不售’点明题旨。当时他借住在令狐绹家里,第一首说令狐不来,五更上朝前派人催商隐有所书写。金翡翠指住处陈设华丽。蓬山指翰林院,恨己不能进入翰林院。次首轻雷指令狐车声归来。虽金蟾衔锁,亦将烧香透入,正写迫切陈情。贾氏爱少年,宓妃爱才华,说明己非其人,已不为所爱,相思只成灰而已。见得令狐不肯汲引。又《无题》(相见时难别亦难)末联说蓬山近,指离翰林院不远,希望令狐绹推荐。虽他已很难相见,但缠绵之情,到死方了。”又曰:“他去东川前,跟令狐绹告别,住在令狐家,又写了《无题二首》(凤尾香罗薄几重;重帷深下莫愁堂)。首言‘车走雷声’,是令狐归而不得见,直到烛暗不来,只能跟柳仲郢去西南。次言不寐凝思,空斋无侣。难禁风波,谁赏桂香。虽相思无益,终抱痴情。在临走时,还在想令狐的援引,希望进入翰林院。”如此郢书燕说、想入非非者,大有人在。试问读者诸君,李义山巴结令狐绹竟然到了“春蚕到死”、“蜡炬成灰”的地步,在令狐绹面前表现出如此臣妾气态,猥贱不堪,你们作何感想?有谁瞧得起他?王茂元会招他做贵婿?郑亚会请他掌书记并且为李德裕的《会昌一品集》撰写序文?卢弘止会聘他做判官并且兼侍御史的五品官衔?柳仲郢会聘他为节度使书记、判官并且加检校工部郎中的五品官衔?还有从前郑州刺史萧洵的爱接,华州刺史崔戎的培植等等,难道他们都是“有眼无珠”错看了人?要知道,注解李义山诗歌的谬误,远不止上述《李商隐》传中所举那些例子,因为《无题》诗虽是义山诗歌中的极品,但毕竟数量少,不占其全诗的十分之一。问题还出现在那些有题诗上。比如《玉山》以玉山比秘书省吗?“神仙才子”指令狐绹吗?《镜槛》中的镜槛是“锦棚之属”吗?“月中”

二句是“想象其闲居无聊”吗？“玉集”二句“不甚可解”吗？《灵仙阁晚眺》中“华莲”二句是“兼寓韦（评事）之入幕与才美”吗？《到秋》可以“解为义山代闺人抒写怀远之情”吗？《木兰》是“托喻令狐”或“借木兰自喻”吗？《离思》是“向令狐陈情告哀”吗？《丹丘》之“凤凰”是指李德裕吗？《青陵台》是王氏死后，义山“负疚自谴”之作吗？《西溪》“末联凤女龙孙自指子女而言”吗？《过招国李家南园》之“新人”指昔时之“新人”王氏吗？《明神》是为李德裕鸣冤吗？《谒山》是“往谒令狐”吗？是“指登山而望景光流驶”吗？《归来》之“波浪眼”谓“水程”？谓“宦海波浪之眼”？王氏死于大中五年春夏之交吗？“卒前夫妇未及见面”吗？（以上问题见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）至于李商隐之生平履历，如说他因婚于王氏而得罪令狐，他究竟是亲牛党还是亲李党，或是在两党中间的夹缝中求生存等重要问题，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。还有那神秘幽隐的爱情诗，如《燕台诗四首》、《柳枝五首》、《镜槛》、《蜂》、《圣女祠》、《重过圣女祠》、《李花》、《河阳诗》、《河内诗二首》、《碧城三首》、《当句有对》、《银河吹笙》、《碧瓦》、《拟意》、《可叹》、《昨日》、《明日》、《如有》、《即目》、《春雨》、《夜思》、《寄远》、《暮秋独游曲江》、《一片》（一片非烟）等等，难道比《无题》好懂吗？前人的笺注、今人的疏解都令人满意吗？汇编、今注、简释本《李商隐诗全集》将对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“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，力图对义山诗集作出比较准确合理而又通俗简明的解释，使专家学者览之不以为简陋，使广大诗歌爱好者读之不以为深奥，可谓化难为易，深入浅出者也。

二

有唐一代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中最好的一个朝代，国力空前强大，经济、文化空前繁荣，各民族关系的融洽，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学术思想的自由，人性的解放，都胜过任何朝代。即使在安史乱后，唐帝国由盛转衰，逐渐走向没落，统治集团也并未因此而箝制信仰自由、学术思想自由，不像清朝那样专横暴虐。所以，当时文化知识界人士能以济苍生、安社稷为己任，揭露和批评各种弊政，敢于指斥朝廷，讽刺皇帝；

而昧着良心为鬼为蜮、甘心舔痔、坚决当奴才的人是极少的，整个民族的精神品格、文化素质是好的。李商隐一生恃才傲物，抑塞于党祸，而新旧唐书本传所谓“放利偷合”、“诡薄无行”，并非实情。朱鹤龄笺本序曰：“吾观其活狱弘农，则忤廉察（开成四年，义山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，调补弘农尉，以活狱触怒观察使孙简）；题诗《九日》，则忤政府（言令狐绹官贵，代表政府）；于刘蕡之斥，则抱痛巫咸（义山有《哭刘蕡》、《哭刘司户蕡》诗）；于乙卯之变，则衔冤晋石（言甘露之变，宰相王涯无辜族诛）；太和东讨，怀积骸成葬之悲（见《随师东》）；党项兴师，有穷兵祸胎之戒（见《汉南书事》）；以至《汉宫》、《瑶池》、《华清》、《马嵬》诸作，无非讽方士为不经，警色荒之覆国，此其指事怀忠，郁纡激切，直可与曲江老人相视而笑，断不得以‘放利偷合’、‘诡薄无行’嗤摘之者也。”冯浩《玉溪生年谱》指出新旧唐书本传不合史实的地方有八九条之多，焉知其品评李义山的那些话定然属实？《旧唐书》为张昭远、贾纬、赵熙等人所撰，由刘昫、赵莹监修，因黄巢、朱温的起义及五代之乱，史书焚毁无数，晚唐诸传大都取材野史传闻，又大都出于牛李党人之手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持论偏颇，岂能尽信？《新唐书》为欧阳修、宋祁编修，虽于《旧唐书》有所补充，标榜“事增于前，文省于旧”，但保存原始资料反不如旧书，书出不久，吴缜即撰《新唐书纠谬》二十卷举其八失。新书本传介绍义山生平略于旧书，而在令狐绹以为“背恩”之后，加上“放利偷合”的话，这也许就是深文周纳之功吧！

李商隐字义山，自号玉溪生、樊南生，怀州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人。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（公元813年），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公元858年），一生经历了宪、穆、敬、文、武、宣六朝，正是史家所谓中晚唐时期。安史乱后的唐帝国，元气大伤，漏洞百出，与昔时相比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！李唐王朝统治力量衰微，藩镇割据日趋严重，宦官掌握军政大权，决定皇帝的废立，官僚群体中又有排斥异己的宗派集团之间的争斗，即所谓“牛李党争”，势同水火，延至唐末，不少文人卷入这场斗争，深受其害。由于朝政腐败，对地方的失控，地主庄园经济迅速发展，土地兼并加剧，甚至公开进行吞并与掠夺，均田制已破坏殆尽，农民流离失所。代之而起的两税法弊端百出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。封建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

方，普遍地荒淫奢侈，京都长安之外，洛阳、汴州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、襄阳、荆州、鄂州、洪州、广州、成都等城市呈现出畸形的繁华，歌楼妓院，昼夜不歇，更助长了地主、贵族、大小官僚享乐的欲望。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正是唐王朝崩溃之前的景象。

怎样的时代，就产生怎样的人物。李商隐一生的遭逢际遇，处处与他的时代密切相关，虽然他只是一个官不挂朝籍的小吏。他出生在一个已经没落的小官僚家庭，父亲李嗣做过获嘉县令，祖父李甫做过邢州录事参军，高曾祖也只担任过县令、县尉之职。他在《哭遂州萧侍郎》诗中说：“公先真帝子，我系本王孙。”自称与皇室同族。那是因为他的祖先李承在北魏太武帝时受封姑臧侯，又以本爵让给弟弟李茂，承、茂的曾祖是凉武昭王李暠，而唐高祖李渊是李暠的七代孙，所以李商隐确实与皇室同宗共祖。惟同源分流，迁徙异地，故属籍失编。从诗人的祖父开始，李家由原籍怀州河内（沁阳）迁居荥阳（郑州），两地相距二百里，中间隔一条黄河。诗人三岁时，父亲罢去获嘉县令，往江南充任地方使府幕僚，“浙水东西，半纪漂泊”，举家随往浙江，诗人在江南度过六年童年生活，九岁或十岁时，父亲病故。“某年方就傅，家难旋臻，躬奉板舆，以引丹旌。四海无可归之地，九族无可倚之亲。既祔故邱，便同逋骇，生人穷困，闻见所无。”（《祭裴氏姊文》）他跟母亲扶柩回郑州，三年守丧毕，迁居洛阳。他“五年读经书，七年弄笔砚”，父歿之前已开始学习生活，父歿之后，在家乡跟堂叔学习古文、书法。这位堂叔学问渊深，曾在太学读书，其父曾为“郊社令”，父死，结庐守墓，遂誓终身不仕。“通五经，咸著别疏，遗略章句，总会指归，韬光不耀……注撰之暇，联为赋论歌诗，合数百首，莫不鼓吹经实，根本化源，味醇道正，词古义奥，自弱冠至于梦奠，未尝一为今体诗。小学通石鼓篆与钟蔡八分，正楷散隶，咸造其妙。”“商隐与仲弟羲叟、再从弟宣岳等亲授经典，教为文章，生徒之中，叨称达者。”（《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》）在堂叔的教导和影响下，商隐十六岁著《才论》、《圣论》，以擅长古文与士大夫往来。大和三年三月，堂叔病逝。十一月，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李商隐为幕府巡官，当时他只有十七岁，尚未登第。“将军樽旁，一人衣白。”（《奠相国令狐公文》）可是令狐楚因为爱他的文才，深为礼遇，“人誉公怜，人谮公骂”，关

系非同寻常。“每水槛花朝，菊亭雪夜，篇什率征于继和，杯觞曲赐其尽欢，委曲款言，绸缪顾遇。”（《上令狐相公状》一）令狐楚是牛僧孺党的重要人物，说他有意为牛党罗致人才，也很可能。他亲自教授商隐和令狐绹学做今体文，即当时流行的四六骈体文，这是做官的重要条件。大和六年二月，令狐楚调河东节度使。本年商隐“被乡曲所荐，入求京师”（《与陶进士书》），令狐楚“岁给资装”（《旧唐书》传），助其入京应考。《上崔华州书》说：“凡为进士者五年，始为故贾相国（谿）所憎，明年病不试，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（郸）所不取。”此书上于开成二年正月初，两次应试失败，当是大和六年、八年的事。大和七年六月，令狐楚入京为吏部尚书，商隐回郑州，谒见郑州刺史萧浣，萧浣将他介绍给华州刺史崔戎，崔戎聘他为幕僚，接着送他“习业南山”（《安平公诗》）。明年应考不第，五月随崔戎自华州至兖州幕府。六月，崔戎病故，商隐西归，往来于河洛郑州之间。大和九年六月，崔戎逝世一周年，商隐由郑州至京城崔戎旧宅吊祭。十一月，发生甘露事变，这是宦官与朝廷（包括皇帝）的总较量。宰相李训、节度使郑注谋诛宦官，事败，训、注、王涯、舒元舆等皆被杀，族诛十余家，死者千余人。甘露事变给诗人以强烈的震撼，其《有感二首》专为此事而作，对朝臣遇害深表痛惋，对宦官的凶残表示极大愤慨。接着又作《重有感》赞赏刘从谏敢于揭露宦官仇士良等的罪恶和“誓以死清君侧”的正义行为，表现了对国家政治前途的关切和爱憎分明的感情。开成元年，他奉母迁居济源，到济源县西三十里的玉阳山学道教。玉阳山是王屋山支脉，山下有玉溪，“故山峨峨，玉溪在中”（《奠相国令狐公文》）。“义山未第时曾习业于王屋山的玉溪，说明他的学仙和习业原是同时事情。”（《李商隐评传》）所以商隐自号玉溪生。开成二年春，商隐考中进士，高锴为主考官。令狐绹当时在门下省为左补阙，高锴“见之于朝，揖曰：‘八郎之友，谁最善？’绹直进曰‘李商隐’者，三道而退，亦不为荐托之辞，故夏口（高锴出任鄂岳观察使，治所在夏口，即今武昌）与及第”（《与陶进士书》）。商隐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率地述及自己中进士，得力于令狐绹的推荐，此信作于任弘农尉时，已与绹关系破裂，但并不否认从前所得到的帮助。进士及第后，于暮春三月东归，向洛阳亲友报喜，回济源安排母亲的生活，到外地聚粮以解决吃饭问题，诸多事情需要亲

自料理。令狐楚早在上一年四月调任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，曾聘商隐入幕，当时因奉母居济源，未赴镇。及第后，令狐楚又催促他人幕，他答应“至中秋方遂专往”（《上令狐相公状》六）。入冬，令狐楚起病，商隐由长安匆匆驰赴兴元（今陕西南郑）。《奠相国令狐公文》说：“愚调京下，公病梁山，绝崖飞梁，山行一千。”他到镇时，令狐楚病已沉重，代楚草《遗表》，十二月扶楚丧回京。开成三年春，应博学宏词科试，考官周墀、李回已经录取他，复审时，有位中书长者说：“此人不堪。”被除名。冯浩《年谱》说：“中书长者，必令狐绹辈相厚之人。”非常正确。但是令狐绹既助他成进士，为何又通过中书长者毁之于宏博呢？学者多以为商隐婚于王氏，做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婿，因此得罪了令狐绹。冯浩说“应宏博正当初婚之际”。他们都以为商隐先结婚后应试。事实上，婚于王氏是应宏博以后的事，开成二年，不可能受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聘，故能受令狐楚之召赶往兴元，三年开春即准备应试，还要请当世显达为之延誉，不可能往泾幕求婚。他与令狐绹之间出现裂痕，应当在中进士之后、应宏博之前这段时间。商隐中进士后，立即写信给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表示感激。“碎首糜躯，莫知其报效。”（《上令狐相公状》五）但他并不愿一辈子做幕僚，也不把朋党关系看得比君臣关系更重要，他一心想通过考试释褐做朝官，以摆脱白衣卑职和贫困处境。《樊南甲集序》曰：“十年京师寒且饿。人或目曰：‘韩文、杜诗、彭阳（令狐楚）章檄、樊南穷冻。’”青年李商隐以挨冻受饿闻名京城。何况老母在堂，弟妹尚幼，作为长男，不得不负起养家的责任。在举家几乎断炊的情况下，他不得不到远处聚粮。令狐楚多次催他入幕，他不就职，却赶往京城谋事。直到令狐楚病重，他才匆匆驰往兴元。令狐楚能理解商隐的苦衷，而令狐绹则未必有其父的气量。令狐楚死后，商隐还要准备应宏博试，李党人物周墀、李回为试官，对他的文学才能颇为赏识，将他录取。朝中既非一党当权，商隐不可能不接触李党，并且向他们表现自己的才能。《上李相公状》说：“某尝因薄技，猥奉深知，麟角何成，牛心早啖。”他把自己受李回的深知，比作王羲之受周顗的爱接。开成二年，他还为李党王茂元撰状文多起，如《为濮阳公上杨相公状》、《为濮阳公上华州陈相公状》、《为濮阳公上陈相公状》等，其时尚未入泾原幕，无非向达官贵要显示自己的才

能。但是,他错了。错误不在于商隐多才,而在于向谁用才。令狐绹为人胸襟褊狭,对商隐不遵守党派戒律自然恼恨,视他为异己分子,故利用与己相厚的中书长者抹去其姓名。李商隐成了牛李党争的牺牲品,应宏博试失败后,不得不另有依投,于是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,茂元爱其才,以女妻之。于是令狐绹找到了商隐背牛党李的铁证,嗤诋他“背恩”,尤恶其“无行”,后来牛党得势,商隐永无出头之日。唐代的朋党不同于今天的政党,不是基于经济的、政治思想的有严密组织、明确纲领的集团,只不过是政治人物们个人关系的网络。朋党的领袖们为了追求和扩大政治权力,往往拉拢那些想分润杯羹的追随者。所谓“牛李党争”是指以牛僧孺为首的官僚宗派同以李吉甫、李德裕父子为首的官僚宗派之间的权力斗争。自穆宗至宣宗朝,两派斗争将近四十年。牛党的领袖人物是牛僧孺、李宗闵、李逢吉,李党的领袖人物是李德裕、裴度、李绅。从两党重要人物的政治业绩和后代史家对他们的品评来看,李德裕比牛僧孺、李宗闵以及令狐父子要高出很多,岑仲勉甚至说“德裕无党”(《隋唐史》398页)。德裕的突出表现在武宗朝,武宗即位以后,首先打击牛党的杨嗣复和李珣;这两人是在文宗朝末年爬上宰相高位的。宦官仇士良要罢他们的官、杀他们的头,因为他们支持过武宗的弟弟和对手。李德裕在840年升任宰相,他不顾朋党利益,三次向皇帝陈词,挽救了政治对手的性命。他是一名极端精明干练的政治家,知识渊博,能言善辩,城府森严,精于算计。他把政敌牛僧孺、李宗闵从高层政治权力中排挤出去之后,对于特别过火的派性清洗活动不感兴趣,能够协调大规模的政府行动,并且向皇帝提交设想复杂的建议。武宗迫使仇士良隐退后不久,仇士良死去,其心腹爪牙被清除。李德裕铲除了宦官的各种权力基地,撤销了他们除神策军以外的其他兵权,使宦官不至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。他领导的抗击回鹘战争以及泽、潞等五州的平叛战争均获胜,顶住了外族入侵、方镇叛乱的危机。李德裕同武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极好,以其特有的魅力赢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神往。宣宗即位,起用牛党白敏中为平章事,务反会昌之政,武宗朝所贬牛党五相同日北迁;而李德裕一贬再贬,最后死于崖州。李商隐无论做地方幕僚还是在京城做九品官秘书省正字,都与牛李党争无直接关系。为摆脱贫困,一行作吏,心怀躁

进,接触过李党人物,在政治上对李德裕表示同情,是事实。但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,李商隐有公心,无派性,他为牛党的刘蕡而歌哭,也为李党的李德裕、郑亚而歌哭,为了什么?为了正义!开成三年应宏博试落榜,明知吃了令狐绹的暗亏,却无力挽回这终生的遗憾。他怀着满腔悲愤径往泾原幕府,登泾州城楼时,写作了《安定城楼》,说自己有贾生、王粲之悲,同时有“永忆江湖归白发,欲回天地入扁舟”的理想抱负,把猜忌自己的牛党权要比做鸱鸢、腐鼠,给予讽刺和蔑视。大约就在这一年夏天,商隐同王茂元的女儿结婚。王茂元是李德裕一派的武人,世代仕宦,大和九年由广州节度使改为泾原节度使。茂元有“七女五男”(《为外姑陇西郡君祭张氏女文》),商隐所娶是茂元最小的女儿。《祭张书记文》说:“维会昌元年,岁次辛酉,四月辛丑朔,二十日庚申,陇西公、荥阳郑某、陇西李某、安定张某、昌黎韩某、樊南李某,谨以清酌之奠,致祭于故朔方书记张五审礼之灵。”文中陇西公等六人加上张审礼共七人都是王茂元僚婿。“韩某”即韩偓之,诗中屡见;“樊南”,诗人自称。《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》云:“一名我漫居先甲,千骑君翻在上头。”韩瞻与商隐为同年进士,名次后于商隐,成婚于王氏却在商隐之前。杨柳《评传》说,两人各娶茂元的两个小女儿,而又均为继室李氏所出,故商隐与韩瞻关系最密切。

开成四年春,商隐至京师通过吏部试,释褐授官,做秘书省校书郎,秩位虽仅九品,但职官清要,可充翰林之选。因受牛党排挤,不久调为弘农(河南灵宝)尉,他将一名死囚改判活罪,触怒了观察使孙简,被罢官,正逢上姚合代孙简,要他还任。明年得河阳节度使李执方(王茂元妻李氏的兄弟)资助,移家长安。本年正月,文宗崩,武宗立,四月,李德裕同平章事。武宗会昌元年,李商隐辞去弘农尉,在华州(陕西华县)刺史周墀幕府。不久居王茂元陈许(河南淮阳)幕,为掌书记。二年春入京应吏部试,以书判拔萃,授秘书省正字。冬天,母亲病逝,因居母丧去官,三年后才服阕入京复官。这期间,他为母亲、先辈戚属和夭亡的小侄女寄寄一共操办了五起葬事,几乎耗尽了仅有的微薄积蓄。会昌三年,王茂元调任河阳(河南沁阳)节度使,进讨刘稹之乱,中道而卒。四年春,杨弁之乱平定后,李商隐离开长安,移家永乐,一方面是因为岳丈谢世,在长安

没有依靠；另一方面，因为家中经济困难，移居乡村减少开支。远离喧闹的京都，过着隐居田园的生活，醉眠花下，展卷窗前，自栽草木，独赏岚光，十分惬意。但是唐朝不是晋朝，李商隐不同于阮籍、王羲之、陶渊明。晋朝人害怕做官，因为政治黑暗，做官危险；唐朝人喜欢做官，因为有盛唐气象和中唐复兴给人带来希望。商隐不甘寂寞，积极用世的思想经常在胸中翻滚，其《春日寄怀》云：“世间荣落重逡巡，我独丘园坐四春。纵使有花兼有月，可堪无酒又无人。青袍似草年年定，白发如丝日日新。欲逐风波千万里，未知何路到龙津！”这种雄心壮志百无一遂的浩叹，令人怵魄惊心。会昌五年春，商隐应从叔李褒（xiù）的招邀，到郑州、洛阳两地住了一段时间，代从叔撰写文章。十月，服丧期满，入京重官秘书省正字。会昌六年三月，武宗崩，宣宗即位。宣宗憎恶李德裕，四月罢为荆南节度使，九月以德裕为东都留守，李党大黜，牛党大重，武宗朝被贬的牛党五相牛僧孺、李宗闵、崔珙、杨嗣复、李珣同日北迁。宣宗大中元年，宰相白敏中与宣宗一道全盘否定会昌之政，提倡佛教，增设冗员，朝政昏暗，贬德裕为潮州司马，李党人物纷纷外放。李商隐被牛党视为叛逆，亦惶惶不可终日，于是受郑亚之聘，到桂州幕任幕府支使兼掌书记。郑亚是荥阳人，元和十五年进士，“聪悟绝伦，文章秀发”，会昌初入朝为监察御史，迁刑部郎中、中丞，由李回推荐，任给事中。其时商隐为秘书省正字，与郑亚相知，故郑亚外调，特邀他入幕。这次远涉桂林，行程近五千里，简直是万里投荒。“明年赴辟下昭桂，东郊恸哭辞兄弟；韩公堆上跋马时，回望秦川树如荠。”（《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》）他在长安东郊与家人告别，心中悲伤！三月初七动身，至五月初九到达桂幕，中经闰三月，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，途中曾经历风波之险，“破帆坏桨荆江中”，险些丢掉性命。但郑亚对商隐非常信任和关心，说是同病相怜也可，说是患难之交也可，凡郑亚权限之内所能做到的，就尽一切力量为他帮忙。开始请商隐掌书记，很快擢为支使，其职位仅次于正、副观察使，还奏辟带六品京衔。士为知己者用，商隐在桂幕为郑亚撰写了许多表、奏、状、启等公文，对郑亚深表感激。其《海客》诗曰：“只应不惮牵牛妒，聊用支机石赠君。”言其不怕旧交令狐绹嫉妒，愿以自己的文彩为郑亚效力。其年秋天，德裕被贬为东都留守后，将其会昌期间的奏议以及“册命

典诰,军机羽檄”编成文集,请郑亚为之序,希望为会昌政绩留下实录。商隐承担了此项任务,代郑亚撰写《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》,称德裕“成万古之良相,为一代之高士”。郑亚与荆南节度使郑肃同宗,称他为族叔,入冬,派商隐往使南郡(湖北江陵)。在奉使途中,商隐写了《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》一首五言长诗,表达了对府主郑亚感激之情和两人之间真挚深厚的友谊。尽管他给令狐绹也写过不少的诗,但是没有一首有如此深沉的情感。舟行途中,他还编定了四六文《樊南甲集》,作了序。大中二年正月回桂林,郑亚派他去代理昭平郡(今广西平乐县)守。二月,郑亚被贬为循州(广西龙川县)刺史。商隐离桂州北归,五月至潭州,替湖南(治潭州,今长沙)观察使李回写了《贺马相公(植)登庸启》,李回没有聘用他。他想溯江西上,去投靠一位任西川节度使的远房表兄杜棕。船至夔、巫一带,考虑杜棕其人是牛党重要人物,为人刻薄寡恩,不可信,于是决计北归。在巴西写了《夜雨寄北》。秋初自江陵出发,入冬返长安,选为整屋(陕西周至县)尉。三年春,谒见京兆府尹,留假参军,专主章奏。“是岁,葬牛太尉(僧孺),天下设祭者百数。他日,尹言:‘吾太尉之薨,有杜司勋之志与子之奠文二事为不朽。’”(《樊南乙集序》)在京兆府为掾曹,起草公文,锁牢门,封印鉴,辛苦忙碌,“归来寂寞灵台下,著破蓝衫出无马。天官补吏府中趋,玉骨瘦来无一把”。(《偶成转韵》)此时,令狐绹官运亨通,已由翰林承旨升知制诰,商隐为求职,曾几度向他陈情,令狐绹毫不理会。李德裕已谪贬崖州一年,商隐写作《旧将军》、《李卫公》,对他表达了深切同情与怀念。其年秋天,刘蕡客死于湓浦(江西九江市),商隐无限伤怀,因作《哭刘蕡》、《哭刘司户蕡》、《哭刘司户二首》。十月,武宁(治徐州)节度使卢弘止聘商隐为判官,得侍御史衔,从六品下阶。商隐携眷至洛阳安顿后,自己冒风雪沙尘之苦,于四年春到达徐州。接着奉使入京。五年春,弘止病死。商隐经洛阳携眷回京,昔时亲友零落殆尽,万般无奈,只好向已登相位的令狐绹陈情,得补太学博士,正六品上阶。但生活清苦,“官衔同画饼,面貌乏凝脂”。“仆御嫌夫懦,孩童笑叔痴。小男方嗜栗,幼女漫忧葵。”(《咏怀寄秘阁旧僚》)秋天,妻王氏病逝。其《房中曲》曰:“枕是龙宫石,割得秋波色。玉簫失柔肤,但见蒙罗碧。忆得前年春,未语含悲辛;归来

已不见，锦瑟长于人！”分别多时，总算是回到京都，可是妻已下世，永无相见之日了。《赴职梓潼留别畏之》云：“桂花香处同高第，柿叶翻时独悼亡。”冯注引《南史·刘歊传》：“歊未死之春，有人为其庭中栽柿，歊谓兄子弇曰：‘吾不及见此实，尔其勿言。’及秋而亡。”“柿叶翻时”显指秋天，不必强解为“春夏之交”（见《集解》）。七月，柳仲郢任东川节度使，辟商隐为书记，十月达梓州幕，改判官，加检校工部郎中，从五品上。冬，赴西川推狱，至成都谒见杜惊，明年春，回梓州。七年十一月，编定《樊南乙集》，其自序曰：“三年以来，丧失家道，平居忽忽不乐，始克意事佛。”曾出资于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建石壁五间，以金字刻《妙法莲花经》七卷。柳仲郢于梓幕乐籍中挑选出歌舞伎张懿仙为商隐续弦，商隐婉言谢绝。“某悼伤以来，光阴未几，梧桐半死，才有述哀，灵光独存，且兼多病。眷言息胤，不暇提携，或小于叔夜之男，或幼于伯喈之女……兼之早岁，志在元门，及到此都，更敦夙契，自安衰薄，微得端倪。至于南国妖姬，丛台妙妓，虽有涉于篇什，实不接于风流。”（《上河东公启》）商隐自来东川后，经常生病，体质下降，又因寄居长安的儿女尚幼，家庭经济状况不好，故没有再娶的想法。“秋蝶无端丽，寒花更不香。”（《属疾》）张懿仙美丽的姿色，却不能引起商隐的兴趣。九年十一月，仲郢内调为吏部侍郎，途中朝令改为兵部侍郎，商隐随他回京。十年春抵长安，十月，仲郢充诸道转运使。本年，商隐未被聘用，往返京、洛，情绪低沉，颇多颓唐感伤之作。如《幽居冬暮》：

羽翼摧残日，郊原寂寞时。晓鸡惊树雪，寒鹜守冰池。急景倏云暮，颓年浸已衰。如何匡国分，不与夙心期！

这是悲哀的绝唱，凄厉沉痛，令人不忍卒读。十一年二月，仲郢罢转运使，充诸道盐铁使，奏商隐充盐铁推官，商隐遂有江东之游。十二年春，仲郢罢盐铁使，任刑部尚书。商隐罢盐铁推官，回郑州病逝，终年四十六岁。商隐死后，他的朋友崔珏写了《哭李商隐》二首，表示了深深的悼念。其第二首云：

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尝开。鸟啼花落人何在，竹死桐枯凤不来。良马足因无主蹕，旧交心为绝弦哀。九泉莫叹三光隔，又送文星入夜台。

三

李商隐一生创作了多少诗文,很难有准确的统计。其《樊南甲集》序曰:“大中元年,被奏入岭当表记,所为亦多。冬如南郡,舟中忽覆,括其所藏,火燹墨汙,半有坠落。因削笔衡山,洗砚湘江,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,作二十卷,唤曰《樊南四六》。”其《樊南乙集》序曰:“自桂林至是所为,已五六百篇,其间可取者,四百而已。”《樊南四六》甲、乙两集所收今体文总共八百三十三篇,四十卷。商隐生前是否编定过自己的诗集,不得而知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:“李商隐《樊南甲集》二十卷,《乙集》二十卷,《玉溪生诗》三卷,又赋一卷,文一卷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:“李商隐赋一卷,又杂文一卷,文集八卷,又四六甲乙集四十卷,别集二十卷,诗集三卷,《蜀尔雅》三卷,《杂纂》一卷,《杂稿》一卷,《金钥》二卷,《桂管集》二十卷,《使范》一卷,《家范》十卷。”李商隐的文学创作,以诗歌成就最高,然而至唐末已行散失。据南宋江少虞《皇宋事实类苑》记载,宋初杨亿“凡得五、七言诗,长短韵、歌并杂言共二百八十二首”。其后,钱若水“当留意摭拾,才得四百余首”。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商隐诗歌集最早最完备的本子是明嘉靖刊本《李义山诗集》,收录诗歌近六百首,后来流传的各本篇目大致相同。商隐的诗歌,内容丰富,题材广泛,体制多样。有反映现实社会的政治诗,有借古喻今的咏史诗,有自慨生平遭遇的咏怀诗,有深情绵邈的爱情诗。至于友朋酬唱之篇,代人答赠之什,以及写景咏物之作,亦不少见。各篇的具体解说见于本书编年诗中,这里仅作简括的介绍。

李商隐的父祖只做过县吏之类的小官,谈不上沐浴皇恩,所谓“我系本王孙”,是要面子的话,其实与唐宗室没有多大关系。商隐关心朝廷,关心政局并不表现在忧虑皇室的安危上,而是表现为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。他敢批评皇帝,指摘朝廷(这两条李、杜皆逊谢不如),揭露和抨击各种时弊,甚至无所畏惧。早在弱冠之年做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巡官时,于军旅中亲闻藩镇割据野心家的凶狂,亲见大军东征,耗尽国家财力而收效甚少,于是作《随师东》讥刺朝廷无能,用人不